

# 1928—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 地位与作用研究

王春

(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地位的变化同其与德国政界、经济界的关系紧密联系。但当德中两国利益相矛盾时,德国顾问团明确选择了中方的立场与利益,这与德国顾问团的私人性质密切相关。这种性质使其不同于纯粹的官方顾问团,不受政府的具体政策约束。中德两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德国顾问团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一方面顾问团因这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顾问团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因利益需求的消失,顾问团也结束了历史使命。

**关键词:**德国军事顾问团;中德关系;中国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2-0076-04

## Analysis of German Military Consultant Delegation's Position and Function in China from 1928 to 1938

WANG Chu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status of the German military consultant delegation in China al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elations to Germ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roups. But when there were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the delegation definitely chose to position for the interests of China due to its non-official nature, which differed from that of the official delegation, free from the restraint of the government. The interests of China and those of Germany were interrelated with the help of the German military delegation as a mediator. That was why it came into existence and developed, meanwhile promoting mutual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When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vanished, the delegation ended its mission.

**Key words:** German military consultant delegation; Sino-German relati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928—1938年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在华时间最长、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外国顾问组织。它对蒋介石政权的巩固、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客观上也对中国的主权独立、国家发展做了一些有益工作,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也推动了中德关系进入历史上一个最密切的时期。因此在中德关系史上占有了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独特地位与作用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即尝试对1928—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这一相关问题做一些考察研究。

### 一、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地位的历史演变

回顾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发展,可以发现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发展是一种不断起伏发展的过程,它在中国政府,特别是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其根本原因实际上是由德国顾问团同德国政府

与经济界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因为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其为桥梁与纽带,沟通同德国政府与经济界的联系,以获得德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各个时期德国军事顾问团能否实现蒋介石对它的这种期望,也就决定了它在中国、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

从与德国政府的关系角度来分析,可将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鲍尔(Bauer)与柯利伯尔(Kriebel)时期可算作前期,这一时期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基本上属于非官方的组织,同德国政府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顾问团成员均为私人性质来华,他们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受凡尔塞条约限制而退役的军官,他们多对魏玛共和国不满而怀念已灭亡的第二帝国。鲍尔和柯利伯尔两人更是具有反共和国的背景,鲍尔因参加卡普暴动而遭到过通

缉,柯利伯尔更因啤酒馆暴动而坐过魏玛共和国的监狱。当时来华的德国顾问在与中国政府签定的工作合同中均写着“……谨为光耀帝国与皇储及促进中德友谊……”<sup>[1]</sup>等字样,可见其私人性质。而德国政府方面因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也一直避免同赴华军事顾问团扯上关系。1929年底,汪精卫发表声明,指责德国政府派遣德国顾问卷入中国内战,德国外交部立即声明:“德国政府从未派遣,甚至推荐任何军事顾问赴华;此类顾问全系中国政府驻德之代表在德境招募之;再者德国政府以尊重国际法为原则,从未赞成任何德人在海外从事军事活动;彼等所冒之(战争)危险应自行负责。”<sup>[2]</sup>但另一方面,德国政府也认识到德国军事顾问团所能给德国带来的利益。德国自“一战”战败后,海外殖民利益丧失殆尽,战败国的地位也使其政治与外交空间非常狭窄,而一个非常接近中国统治最高层的,可对中国的决策产生影响的顾问团给德国带来的政治、经济利益,是不言而喻的。故德国政府在对德国顾问团采取明里反对,暗里默许的态度。当时德国顾问在同中国政府签定合同后,大多向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报告其赴华的目的,而德国外交部从未拒绝发给护照。据说鲍尔所持护照为官员护照,负有商务任务,而德国外交部则声称鲍尔护照上的“商务”字样是中国驻德公使馆签证时加入的。无论此事是否属实,鲍尔所具有的经济背景仍使其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得以建立德国军事顾问团组织。鲍尔之后代理总顾问柯利伯尔因不具有鲍尔的背景,不受蒋的看重,不久被魏采尔(Wetzel)所取代,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前期结束了。

由魏采尔时期开始,历经塞克特(Seeckt)时期、法尔肯豪森(Falkenhausen)时期为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后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顾问团的官方色彩大大加强了。当时德国国防军正走上重整军备的道路,它们需要在中国建设正规军队及使用新式武器的经验,更需要德国缺少而中国蕴藏丰富的战略原料,而德国经济界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又急需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以出售工业产品与设备。故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德国政府那里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德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它的控制。这一时期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虽主要还是德军的退役军官。但德军的退役军官同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的军官退役后即成平民,除战争等紧急情况,很少同军队再发生关系。而在德国,军官是终生职业,即使退役也被视为二线军人,随时与军队保持联系,随时可能应召复役,在重要场合均着军装并佩戴勋章,通信时要自称军衔。因此,在华的所有军事顾问事实上都要受德国国防部的领导。所以,当蒋介石准备寻找一位德军高级军官替代柯利伯尔时,德国国防军遂同意魏采尔中将来华。需要说明的是,魏采尔中将当时虽被兴登堡解职,但并未退役,仍是德国国防军的现役将领,这既不同于鲍尔、柯利伯尔这些“一战”后即退役,已脱离军队十年之久的顾问,甚至与其后塞克特与法尔肯豪森不同,后二者来华前已正式退役,为了使魏采尔能够来华,国防部特批准给假,让他离职在编,以备回国再任

新职,可见德国政府对驻华军事顾问团的重视程度。

魏采尔来华后,以布林克曼(Brinckmann)中校为其在德国国防部的联络人,自此以后,历任德国总顾问均通过布林克曼定期向德国国防部报告顾问团在华工作状况及其活动,以及其在华所取得的工作经验和他们对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情况的汇报。德国国防部还控制了驻华军事顾问团的人事及部分军火贸易。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曾对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表示,每位顾问来华前,都须经他自己亲自审核与批准<sup>[3]</sup>。

然而魏采尔由于对经济问题不重视,及其个性原因,不仅使蒋介石失望,也招致德国经济界的报怨,而他忽视向德国国防军报告工作情况,也引起德国国防部的不满,由于主客双方均对其不满意,终于离职。继之而来的塞克特由于与德政府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时主持德俄军事合作期间与德国经济界的关系而大大推动了中德关系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地位,其后继者法尔肯豪森继承了塞克特留下的良好形势,把中德关系推向高潮,直至顾问团被召离华。

综观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组织发展的历史,虽然表面看起来错综复杂,但决定其曲折发展的历史的根本原因实际就是其能否实现中德两国的利益要求,由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考察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历史的准绳。

## 二、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独特地位分析

将德国顾问团同其他时期来华的美国顾问团和苏联顾问团相比较,可发现美、苏两国的顾问团因是纯粹的官方顾问团,故其来华的使命非常明确,即推行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其在华的一切行动皆依本国的对外政策为准绳,绝不会同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相对立。而因为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私人性质,使其同德国政府的关系非常微妙。虽然如前所述,德国顾问团来华是得到德国政府的默许和暗中支持的,德国顾问团同德国政府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主要是同德国国防部的联系。而德国军队无论是在魏玛共和政府时期,还是在纳粹政府的前期(希特勒尚未完全控制德国国防军时期),都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在对外政策等一些问题上同本国政府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对把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视作德国远东政策的代表和推行者的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事实上,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工作的情况看,其行动多有同德国政府的政策不和,甚至相对立之处。如德国魏玛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严格遵守凡尔赛和约,对国际争端持中立态度。但魏采尔却不顾德国政府的禁令,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赶赴上海协助,事后当德国政府责难他时,他以去上海看望家人为借口搪塞。而当1933年长城抗战时,魏采尔又赶赴华北,一待就是半年,他还陪着宋子文在前线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公开讲话,引起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应,给德国政府引来外交上的麻烦。

希特勒上台后,其远东政策日益显示出与日本相勾结的趋势。1936年11月,双方签定了《反共产国际

协定》。而此时法尔肯豪森领导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正全力帮助中国政府进行抗日战备工作,无论从战略筹划、作战计划、国防工事的建设,还是部队的训练、整编、装备等等,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尽管纳粹党在德国已取得了政权、纳粹党的立场即是德国政府的立场,但对于在华的纳粹势力,据法尔肯豪森回忆道:“当时在南京,也有一个国社党国外组织的地方集团,由于德国顾问多半是反德国社会党(即纳粹党)者,所以他们的势力并不大,而且,凡有违背我们在中国职守的任何政治活动我均一律予以严厉禁止。”<sup>[4]</sup>这简直可看作是反政府行为了。

而当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的立场明确地站在日本一方。戈培尔(Goebbels)在1937年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并不认为(中国)局势严重。中国在军事上不充足,日本打败她,这非常好,因为这可以使日本更灵活地对付莫斯科。(我们)不会再进一步支持中国了。”<sup>[5]</sup>而此时驻华的德国军事顾问们正全力帮助中国人民抗战,在战争中坚决地站在中国一边。尽管在德国政府的勒令下,法尔肯豪森表面上也参与了“陶德曼调停”活动,但这显然不是法尔肯豪森的本意。这在“陶德曼调停”进行期间,法尔肯豪森于1937年12月5日撰写的备忘录《简论形势》中可以证明。他写道:“大体上可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地、长时间地加以抵抗。目前,到处都出现了可以给敌人以重创的机会。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所有军官、士兵以及全国人民都必须奋起,全力抵抗……”<sup>[5]</sup>可见,德国军事顾问团的行动多有同德国政府的政策相矛盾之处。

但也有与德国政府政策合拍之处。如德国政府希望借助顾问团推动德中经贸关系,以维护德国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整个在华期间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竭力推动中德间的军火贸易,使德国对华军火出口在德国顾问团时期增加了数十倍,为德国工业界赢得了大量利益,此外,他们还把德国资本与技术引入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中,进一步为德国谋取了经济利益。再如德国整军备战时对战略原料的渴求,促使德国顾问团全力推动以中国的原料换德国军火的易货贸易的开展。显然,德国军事顾问认为这是符合德国国家利益的,因此全力推行之。由此可见,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地位的独特性。

### 三、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对职责与利益的抉择

德国人的特点是认真负责,恪尽职守的,他们既然受聘于中国,自然要忠于其在中国的工作。因此,当德国企业与中国利益相冲突时,正是考验其是否忠于职守。这其中少数顾问,如魏采尔时期的布凯斯特(Bukist)等人因过分偏袒德国企业的利益而有损中国的利益,引起中方的不满,一度使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地位下降。以至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批评道:“彼所关心者无他,仅企业而已。”<sup>[6]</sup>但绝大多数顾问都能做到忠于职守,不损害中国的利益。如鲍尔来华时,是几家德国大企业的代表。当时德国各企业均暗自向中国各地方军阀出售武器,以牟取利润,这是当

时南京政府坚决反对的。因此当鲍尔代表的企业企图向地方军阀出售武器时,他明确地站在南京政府一边。而塞克特在任时,在中德贸易时决定交易对象前,拒绝接见任何公司的代表。至于法尔肯豪森则在此问题上更坚决地维护中国的利益。例如,1934年德国克虏伯公司(Krupp)同莱茵钢铁公司(Rheinmetall)竞争中国一笔900万马克的重榴弹炮订单,德国国防部担心两家竞争会使德国经济利益受损而出面促使两家达成妥协。法尔肯豪森认为此举有损中国利益,认为德国企业应通过降价和适应中国需要适时供货来提高竞争力。结果德国国防部通过外交部密电法尔肯豪森:“勿干涉莱茵钢铁公司生意……我们在此地所有事务皆依德国利益,已作完善安排。”<sup>[7]</sup>

另据法尔肯豪森回忆,“我常出面以强调,宜斟酌中国特殊情况而提供意见为原则,职是之故,我常竭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上述这种立场我一直坚持到底。当时合步楼(Hapro)公司试图向中国销售一批军火和武器。这种武器固然适合于欧洲战场,但依中国人之需要却没有考虑的余地,因此我曾代表中国提出异议”。“有一批德国年轻党员(纳粹党),其主要任务专作党政演说,明目张胆地以为只要有人给中国销售若干货品,不论品质优劣,中国人也就求之不得,尽够满意了。他们并要求我站在德国利益方面坚持此种立场。我却不以为然,并屡次给他们作辩论的解释,认为他们的此种立场不仅会损伤德国的信誉,也将减削商业方面的利益,因为我在中国服务,唯有介绍适合中国需要的物品,才算称职”。<sup>[7]</sup>可见,德国军事顾问基本上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 四、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历史作用

回顾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十年历史,可以发现,中德两国关系由疏远至密切。这是由于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互补需求所决定的。政治上,德国希望逐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恢复强国地位,而中国则希望可以由弱小逐步强盛起来。军事上,德国希望重整军备;而中国南京当局则希望铲除地方军阀,扑灭革命火焰,抵御日本的侵略,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权。经济上,德国希望占领中国市场,从而恢复发展本国经济,而中国则希望获得德国的工业品、资本、技术,从而建设一个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甚至实现工业化。

而双方的这些互补的需求,恰恰是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作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一方面,双方的需求促成了德国军事顾问团这一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南京当局积极主动地谋求聘请一个有组织、有影响的德国顾问团来华,希望通过其沟通同德国各方面的联系,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德国经济界从经济利益考虑,从一开始就积极促成德国顾问团的来华。而德国政府也认识到顾问团的价值,故虽在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下,仍默许甚至支持顾问团的来华,随着德国国家发展政策的改变,对中国的需求增加了,更将原来民间性质的顾问团提升为半官方的性质。另一方面,德

国军事顾问团通过自己的工作,很好地实现了其所肩负的期望与使命。德国顾问团在维护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增强中国国防实力,协助中国抗战的同时,也把其在中国的建军经验和在战争中所检验的德国军事理论与新式武器的情况报告给德国国防军,以利于其整军备战。德国顾问团在提高中国军队现代化水平,帮助建设急需的、一定规模的国防工业的同时,也为德国经济界赢得了大量订单和急需的战略原料,从而满足了各自的需要,也促进了双方关系的发展。德国军事顾问团也因此得以接近中国的权力中枢,该团的历任负责人如鲍尔、塞克特、法尔肯豪森也获得了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空前的影响力。这是德中关系史中绝无仅有的现象,也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末其他国家所无法达到的。

德国军事顾问团也因此在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都留下了重要的影响。军事方面,德国顾问对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训练、装备和对军官的军校教育,一方面加强了蒋介石相对于国内其他各派力量的优势,有助于蒋介石统治地位的巩固,如新式“模范部队”曾频繁地征战于各个内战战场,并取得了显赫的“战果”。另一方面,这样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显然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此外,德国顾问对于中国对日作战战略策划、作战计划及国防工事的建设也作出很大的贡献,当中日战端开启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协助中国抗日。总而言之,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主要军事工作从其最终作用和影响来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政治上,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成员除少数文职人员外,其余均为德国退役军官(个别如魏采尔为现役军官),其中绝大部分为“一战”前的军官(如鲍尔),或主要军旅经历在“一战”以前(如塞克特)。因此,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思想仍停留在“一战”以前的德意志帝国时代。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德国在西方列强中同日本类似,均带有明显的封建专制的思想残余。而德国军队更是这种保守、反动思想的极端代表。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们自然也是这种思想的拥护者,这也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一战”后采取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德国魏玛共和政府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些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们在政治上带给中国的影响,当然也不可能是进步的、积极的,更不可能是革命的了。因此协助蒋介石一步步走上独裁专制的道路,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而在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方面,则更充分暴露了德国顾问在政治上的反动立场。在德国,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血腥的仇敌。德国军事顾问来华后,也全力以赴地帮助蒋介石进行了反革命的“剿共”战役。魏采尔就曾得意地说

过:“在我们德国由诺斯克(Noske)领导的反共战争中,采取了残酷手段并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而我在中国也做了同样的工作。”<sup>[5]</sup>可以说,德国军事顾问完全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

在经济领域,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来华及其在此从事的活动有深刻背景。而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工作中也以各种方式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这些工作对中国方面也是有益的。德国军火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为准备抵抗日本侵略而进行的国防工业建设完全是在德国资本与技术的帮助下进行的。向德国出口钨等战略原料,客观上也是把中国当时无法利用的资源换成中国急需的武器和工业设备,对中国也是有益的。因此德国顾问推动的中德经贸合作对中德双方是互惠互利的,这既符合德国政府和工业界对德国顾问的期望,也与蒋介石政权引入德国顾问的初衷相一致。因而,由此也推动了中德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高潮阶段。由此可以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经济方面的影响毫不亚于其在军事方面产生的影响。

总之,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历史无论是在中德关系史中,还是中华民国史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其在华的组织沿革和其主要的工作活动,都应该得到详实的记述,其活动对中德两国的关系,及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应当得到客观、公允、辩证的评价。这也必将有益于中德两国关系当前与未来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历史工作者所应持的态度与担负的责任。

#### 参考文献:

- [1]傅宝真. 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史传(一)[J]. 传记文学(台湾), 1973, 23(3): 9.
- [2]傅宝真. 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史传(三)[J]. 传记文学(台湾), 1974, 25(1): 95.
- [3]傅宝真. 抗战前及初期之驻华德国军事顾问(九)[J]. 近代中国(台湾), 1989, (3): 182.
- [4]马振犊, 戚如高. 敌乎? 友乎? 德国与中国抗战[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69.
- [5]费路. 国民党中国的军事顾问[J]. 民国档案, 1994, (1): 67-68.
- [6]傅宝真. 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史传(五)[J]. 传记文学(台湾), 1974, 25(3): 98.
- [7]马文英. 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推展[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 1994, (23): 153.
- [8]辛达漠. 法尔肯豪森将军回忆中的蒋委员长与中国[J]. 传记文学(台湾), 1972, 21(1): 66-67.